

论阿里·沙里亚蒂的社会思想*

裴云涌¹, 王泽壮²

(1. 内蒙古民族大学 校办,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2.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阿里·沙里亚蒂伊斯兰革命的三大著名理论家之一,也是伊斯兰革命早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激进思想对革命力量动员,特别是对伊朗知识青年以及左翼革命游击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社会思想主要通过定义“乌玛”来表达,对当时的伊朗社会也有着非常独特的分析和结论。本文主要探讨了沙里亚蒂的理想社会“乌玛”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伊朗社会的独特体认。

〔关键词〕阿里·沙里亚蒂;“乌玛”;“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

〔中图分类号〕K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9)04-0014-05

沙里亚蒂(1933—1977)是伊斯兰革命三大理论家¹之一,在伊斯兰世界,也是继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以来最著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作为伊斯兰革命理论家,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不仅有效地动员了伊斯兰革命的主力军——左派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学生为主体),而且,他的某些思想也在伊斯兰革命早期社会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和分析一下作为他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主要内容之一“乌玛”蓝图,以及他对伊朗当时社会现状的看法。

一、对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的勾画

沙里亚蒂对理想社会“乌玛”的勾画,是与他的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他的历史观。

沙里亚蒂的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汲取了营养。按照其本人说法,他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吸收之后的“科学决定论”基础之上的,即强调,历史过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人”和“人的意识”可以起到某种作用。他说:“历史过程就是辩证运动、通过矛盾运动展开的过程。整个历史上存在的一切社会,无论从民族的和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上来理解,都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在每个阶级社会内部,都存在着两大敌对阶级,一方是帝王、财主和贵族,另一方是神和人民。一方是多神教,另一方是一神教。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只相信人被经济因素决定,或者根据他在社会中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他的阶级属性。实际上,人在社会上的财富

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的阶级属性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变化不定的。况且,如果按照财富多寡来进行阶级分类,一个人就被经济状况所决定了,反抗也失去了意义。而我的科学决定论则认为,阶级首先是根据财富多寡来决定的,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人的意识可以在阶级变化中发挥作用,如果人在其中不能发挥作用,人的意识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人与动物也因此失去了区别。”^{〔1〕}

沙里亚蒂根据自己的这套“科学决定论”对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史进行“社会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总是处处在展开。”^{〔1〕}历史从某个地方开始,必然要通向某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方向……我相信历史会必然地朝着正义最终胜利、被压迫人民最终得到拯救,而压迫和阶级压迫不是不可避免的方向运动。我的历史观与马克思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曾说“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正如人在社会中一样,是独立于个体之外”,而我给“人”在历史进程中以地位。如果说,后来有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么应该是从列宁和毛泽东摆脱十九世纪以来的唯科学主义和唯社会论思想开始的。”^{〔2〕}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他又根据自己的“科学决定论”指出,伊斯兰发展史从出现“哥哥该隐杀害弟弟亚伯”^{〔3〕}开始,就存在两大对立阶级,两人分别代表不同的生产方式,该隐代表的是农业生产方式,而亚伯代表的是游牧生产方式,该隐战胜亚伯,是农业生产方式对游牧生产方式的胜利,并认为,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历史阶段都存在的斗争,将永远持续下去^{〔1〕}。

*〔收稿日期〕2009-04-06

〔作者简介〕裴云涌(1975-),男,内蒙古科左右旗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办讲师,主要研究中东国际关系;王泽壮(1969-),男,安徽合肥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伊朗近代思想文化变迁。

但同时,沙里亚蒂一再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最大的理论缺陷是忽视了“人的意志”(Will of Man)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忽视了宗教因素对历史的巨大反作用。他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比马克思高出一筹。沙里亚蒂还说,按照马克思的智力水平和人道精神,他不应忽视宗教的历史反作用,马克思之所以执意不提宗教的好处,乃是因为他因为爱情上挫折,才使他对宗教产生了憎恨情绪,就像诺贝尔因为爱情挫折执意不设诺贝尔数学奖一样^[1]。

由此看出,沙里亚蒂的历史观便是“阶级分析法+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历史总的发展趋势是,在阶级矛盾规律支配下和“人的意志”作用下,逐渐走向人的解放和正义必胜的方向,越来越接近于“善”与“完美”的过程。

那么,“人的意志”在沙里亚蒂的历史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沙里亚蒂完全接受了萨特的一套存在主义哲学观,认为人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对“人的意志”起到限制作用的外部因素只有“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衣食住行以及与其相关之生理必需”。除此之外,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因此对自己的选择绝对负责。在《伊斯兰学》一书中,他批评那些“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意志”捆绑在“经济决定论”绳索下,人丧失了自主性,人成了“被决定物”,成了“机器人”^[3]。沙里亚蒂用形象的语言对“人的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解说:“人在历史中,就像鱼在河流中,河流的进程可以经过湍急、浅滩、狭流、深谷,还有可能遇上长时间地质年代形成的瀑布。可是河水里的鱼,则能够朝着不同的方向游来游去,甚至还能逆流而上。人,就其本身而言会受到科学的因果法则影响,可是,也有选择行为方向的自由,甚至还可以选择自杀。”^[4]

人是唯一一种可以反抗自己的生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需求,或者抛弃善和美德的动物。而且,他还是唯一可以不按照理性去行为的动物,可作恶,也可行善,可以像泥土,也可以具神性。更重要的是,拥有“意志”是人的最大特点,显示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伊斯兰最重视人的意志在完美过程的作用。”^[5]

在“人的意志”,即人的“主体性”提高到方法论之后,沙里亚蒂便开始把“主体性”应用于社会改造,开始张扬“人的意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首先,他认为,推动历史变革的起点是人的观念的变化,因为,人的一切行为均由观念所支配。改变人的观念,必须正确地运用“创制”。他说在伊玛目隐遁之后,穆斯林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创制”问题,因为“创制权”被萨法维教士垄断后,人们只知道一味“效仿”,丧失了自己的“创制”意识,个人意识也随之丧失了。没有人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判断力,人便成了受外界和命运驱使的奴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里亚蒂才强调指出:“通过自己思想上的‘创制’是每个穆斯林的客观义务。”^[3]其次,沙里亚蒂提出,每个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都必须做到“弃恶扬善”,这是穆斯林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是体现“人的意志”的基本要求。这是“所有人——群众、被压迫的人、知识分子和

商人——的使命和义务,所有人都有责任做到这一点。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存在例外和中立。”^[6]再次,沙里亚蒂还主张,为了接触到新鲜事物,保持精神活力,力求达到更完美境界,每个穆斯林都应像先知那样择善而“迁徙”,从既要做到内心的“迁徙”,又要做到空间上的迁徙,唯有“迁徙”才可以摆脱僵化和墨守成规^[6]。总之,在沙里亚蒂看来,只有把“人的意志”充分发挥出来,才能表现出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有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出来,人(类)通往理想社会之路才有可能,才有起点。一句话,观念改变社会,信仰造就历史。

沙里亚蒂对理想社会的勾画和展望,正是建立在这个动态的“主体性”之上。他在一篇《理想社会——乌玛》演讲中进行了集中和浓缩:

“伊斯兰的理想社会叫‘乌玛’。这个词还有道路和愿望的含义。因此,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拥有一种共同信念和目标,带着奔向或走向共同目标的愿望走到了一起。

其他定义人类共同体的表述中,经常以血缘和土地的同一性以及物质利益共同拥有作为社会划分的依据,而伊斯兰,通过选择‘乌玛’这个词作为自己的理想社会,则确立了以某种社会观为基础,指向同一个目标运动的知识分子责任。

‘乌玛’社会的基础结构是经济,因为‘没有物质生活,人绝不会有精神生活’。它的社会制度是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为基础,以恢复‘亚伯的制度’——人人平等,由此而人人皆兄弟的无阶级社会。这是一条根本原则,而不是目标,不像在已经保留了西方市民社会的世界观的西方社会主义中。‘乌玛’的统治哲学和政权形式不是领导人民主、不是没有责任且没有方向感的自由主义——其仅仅为竞争势力手中的玩物、不是臭气熏天的贵族政体,不是反大众的专制,也不是强奸民意的寡头政治,而是‘有领导能力(不是领导人,因为那样就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纯洁’、有使命感和革命性的领导阶层组成,负责提出社会进步和成熟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负责提出创造性的计划和方案以实现人的崇高归宿。”^[1]

沙里亚蒂所勾画的“乌玛”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要求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又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给“民主”附加了“道德前提”,这一内在矛盾既反映了沙里亚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又反映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伊斯兰道德观念,更反映了沙里亚蒂思想中,既要吸收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民主”,又想保留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的内在思想矛盾。沙里亚蒂思想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普遍存在的内在矛盾,说明了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历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沙里亚蒂本人而言,虽然他可以做到非常激进地解释伊斯兰,对许多宗教问题和社会现实得出了石破天惊的激进结论,但他的价值观,归根结底还是向传统价值观倾斜的,或者说,他的价值观系统中,传统价值观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这一点,在他定义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时表现得最清楚。

二、对当时伊朗社会独特性的体认

沙里亚蒂在勾画出自己的“乌玛”蓝图后,便以“阶级分析法”为工具,把历史上各种宗教划分为“统治阶级的宗教”和“被统治阶级的宗教”,而且,他还进一步把伊朗人民普遍信仰的什叶派宗教划分为“阿里什叶派”和“萨法维什叶派”。这种划分有明显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造成伊朗社会的今天局面——贫穷、落后、依赖和不发达的局面,不仅有历史原因,更与宗教界保守、安于现状、偷安和僵化,并且与统治者密切勾结在一起有直接关系”^[6]。他认为,在历史上一直掌握社会教育资源和拥有价值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一崇高社会地位的“乌里玛”的“精神退化”和“生活堕落”,是造成伊朗社会落后的深层的内部原因,国际振兴的前提是每个国民精神上的强大,强人必须强心,至于“外部的冲击和压迫,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只要民族精神还在,民族自信和认同感还在,那么,这个民族终究会有望振兴的。”^[7]总之,要摆脱目前压迫、贫穷、落后和依赖的现状,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所能做的工作,首先是要深入研究自己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朗民族文化精髓——什叶派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为现实服务;其次,要充分吸收西方文化遗产的精髓,尤其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精髓,把两者结合起来,然后普及到整个社会,在伊朗来掀起一场“伊斯兰清教改革运动”^[4]。

在《伊斯兰教中间派》一文中,沙里亚蒂曾经痛心指出过,造成伊朗今天落后、不幸和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精神贫乏,丧失了真正信仰,伊斯兰已经被那些传统教士“玷污”和“歪曲”得不成样子。而且,社会中普遍流行着各种“不纯洁”的思想,道德沦丧,青年人的“信仰的火光”被各种各样的西方“伪学问”、“伪道德”所充斥,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就在于社会成员的“心智未开”,“人民愚昧”和“信仰不纯”。总之,“不幸、不满和不发达的根源是精神贫乏”。^[8]

既然“不幸、不满和不发达的根源是精神贫乏”,那么,“精神贫乏”的现状是怎样的呢?在一篇演讲中,沙里亚蒂首先分析了伊朗现行的社会结构及其性质:

从历史定位上讲,穆斯林社会目前状况,与欧洲的现状相比,是处于欧洲社会中世纪结束和文艺复兴开始那段历史时期。与那个时代相似的是,我们今天穆斯林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和思想变迁过程中。从经济上说,穆斯林社会的主要经济是一个“农业市场”,或者说中间商为主的经济,换句话说,最大的和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而不是平时人们所理解的城市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的经济制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那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曾经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资产阶级,与我们今天伊朗和其他穆斯林社会的资产阶级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资产阶级只有巴扎商人,都是做些中间贸易、批发、转运之类的中间生意,而不是现代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更确切地讲,我们的这些巴扎商人,根本不是像现代欧洲资本家那样有魄力和进取精神,他们的作用不过是充当农业部门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而已。当然,我们已经看到有一股像十

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那样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只是他们的社会影响远不及后者那样大罢了。伊朗新资产阶级是什么性质?只不过以现代超市取代了传统商店,只是充当在传统社会里传播西方文化的中间人而已。原来的经济结构没有丝毫变化,与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生产的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不同,伊朗正在兴起的所谓新资产阶级只是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消费,对农业发展没有任何贡献。你在城市中,满眼看到了都是金碧辉煌的大楼和高级汽车,城市越大,大楼越高。你到农村去看看,那里情况怎么样一切就明白了。当然,也有人开始了城市生产,但是都是一些七零八碎的小工厂,根本配不上称为民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9]

为了强调穆斯林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在同一个时代,他还在一篇演讲中以沙特阿拉伯国为例:“沙特阿拉伯有惊人的工业资源和西方工业生产,可是它的工人(与西方社会的工人不同——引者加)却是生活在一个最原始、最腐败的社会中。那里,只有500到2000名工人处于上层,(与伊朗一样——引者加),但这个国家整体上没有工人阶级,根本谈不上是现代社会。它有的是部落、农业和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基础。

从某些方面讲,我们连欧洲十九世纪的水平都赶不上,把我们亚非两洲的某些社会特征与欧洲当时相对比,我们可能仅处于欧洲十三世纪的水平。

……

欧洲资产阶级进步到可以造就一场法国大革命,而我们资产阶级不过是窝在巴扎市场的做中间买卖的小商小贩而已。”^[4]

他认为,穆斯林社会尽管与欧洲一样同处现代,但是,他们的历史发展阶段完全不在一个阶段上,欧洲早已有过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而穆斯林社会还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起步阶段,还属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早期”,或者说“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4]而且一开始就有畸形特点,即没有工业资本,只有不成熟的国内商业贸易,依赖于外国商品的中间商人、投机商人和买办资本家。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太过弱小,根本不能构成阶级整体力量对国家(state)政治形成压力。因此,指望他们来引导或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事。西方社会苦于太发展,而东方的穆斯林社会苦于不发展,西方社会苦于消费过度,而东方社会还为饥饿而痛苦^[4]。他认为,穆斯林社会与欧洲相比,不仅不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类型”上,穆斯林社会与其他社会完全不同:

“我们也要了解我们文化属于什么类型。比如说,希腊是思辨文化,罗马是尚武和艺术文化,印度是唯识论文化,而我们社会是宗教的伊斯兰文化。我讲的‘文化类型’是指,对一个特定社会中,在其成员的认识、特征、感情、传统、世界观和理想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倾向。能够把上述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其意义的正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化,我们在其中呼吸、获取营养和成长的文化。正因为如此,理解

一个社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理解了这个社会的内在真相、内在感受和内在感情。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对希腊文化有哲学上的了解和理解,你就很难说他就掌握了希腊文化。同样,假如一个人对佛教和吠檀多^[8]不理解,你就很难说这个人就是印度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样,一个人没有连他所在的社会普通成员的心理上没了解或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启蒙者。……印度文化是吠陀文化,一个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社会学家对印度没有什么意义。甘地,对印度社会有深刻的理解,理解人民的心理状态,他能够比别人更能推动印度进步。一个启蒙的穆斯林情况也如此。他必须知道,伊斯兰精神不仅支配着他的文化,而且他的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整个社会过程,都受到伊斯兰精神塑造。西方人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正常的。可以,如果我们眼下所谓知识分子,也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对这个社会的关联性和作用就受到限制,就有局限性。一个人总体上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他言谈举止受到欧洲教育和外国生活方式的限制,这个人就不会与自己的人民打成一片,反过来,这个社会也不会接受他。”^[1]

按照沙里亚蒂的理解,穆斯林社会的“文化类型”决定了穆斯林社会的进步必须从改造穆斯林的思想觉悟开始,用新思想来教育他们,唤醒他们^[4]。因此,一个不精通伊斯兰学(Islamology)的人,不了解穆斯林群众思想的人,连与穆斯林建立联系都谈不上的人,怎么可能谈得上改造穆斯林的思想觉悟?可是,伊朗眼下的思想现状是:

“在伊朗,一方面,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控制我们宗教的人,把我们的宗教变成了现在这个毫无活力的样子,另一方面,能够理解现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启蒙者又不理解我们的宗教。结果是,尽管我们的伊斯兰教中有丰富的、足以让伊斯兰教获得解放的文化和历史,拯救伊斯兰世界所必须的宗教觉悟我们伊斯兰社会至今还缺乏。启蒙者错误地反对伊斯兰,认为伊斯兰是落后、保守的、狂热的、只关注来世的,把穆斯林社会的落后认为是伊斯兰落后造成的结果,而反动者又极力利用宗教来麻痹群众,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真正的伊斯兰还不为群众所知,禁锢在历史深渊,群众沉迷于自己的陈规陋习而不觉,启蒙者孤立于群众,为群众所厌弃。”^[9]

摆脱穆斯林社会落后,促使穆斯林社会进步的关键在改造穆斯林的思想,可是,统治者利用宗教,普通群众“沉迷于自己的陈规陋习而不觉”,知识分子的一套理论又不为群众所接受——这就是沙里亚蒂当时所面对的思想现状。他说这是“最令他感到悲哀的”现状^[9]。

沙里亚蒂在认识伊朗当时的社会现实时,经常以西方社会和历史,尤其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欧洲社会和历史进行对比。他认为:“我们今天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欧洲的影响,他们的思潮、他们各种各样的生存表现如物质的、精神的、艺术的、文学的,甚至道德准则,正在进入我们的社会。因此,必须了解西方、以及西方是如何让走到今天的,以便我们对它有清醒的判断。给欧洲带来新文明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因素

和思想因素。经济上,从封建制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从低级贵族中出现了。这是因为东西关系、十字军东征、美洲和澳大利亚发现、重商主义、掠夺亚非拉甚至北美。思想上,天主教变成了清教。要知道,十四世纪的自由思想家并没有否定宗教,他们只是把来世关注变成此生关注,把倾向精神、本性、伦理和禁欲主义转变为劳动和勤奋,从内敛性自省转变为外向性表达异议,从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总之,欧洲进步的精神资源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源于自己本身,是孕育在欧洲人心中的同样强有力的文化和宗教资源被重新整理和激活,被自由思想家变成了有活力的、运动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力量。”^[4]

接着,他在演讲中分析说,欧洲人的创造潜能,不是因为比别人的人种优秀,而是因为欧洲人有精神创造性,具体地说,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从天主教的控制和压抑中得到释放,推动文艺复兴的“自由知识分子”把“人的自由意志”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灵感和原动力仍然来源于对神的信仰,用“宗教反宗教”。穆斯林社会的今天文化是伊斯兰教占据支配地位的宗教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刚开始的基督教一统欧洲相似。但是,两者之间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统治欧洲的社会支柱力量是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其统治势力在城市一直是相当脆弱的,因此,欧洲一开始就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世俗文化存在,这个世俗文化一直与享有城市自治权的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套价值观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强大,迫使宗教势力回到信仰领域,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不仅可以造就一场法国大革命,而且有力量、有能力把宗教势力曾经掌握的社会资源接过来,然后以自己的一套市民社会价值观,取代了宗教价值观,结果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势力与国家世俗事务分离^[9]。

在另一场演讲中,他还强调说,尽管欧洲在立法上把宗教与政府分离,但只是意味着某些宗教领袖的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分离,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生活分离,欧洲的立法观念“人人平等”,既来源于宗教价值观“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也得到宗教价值观的支持。他还提醒听众说,欧洲人的宗教虔诚程度不亚于穆斯林,并以自己在法国的经历为例,说明法国的宗教人士在国家中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还有宗教狂热分子^[10]。

三、总结

沙里亚蒂勾画的理想社会“乌玛”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这个理想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永久地处于某种运动中,有明确的“方向感”,具有“动态涵义”。第二,这个社会不是按照一般的定义确定的,既不是“地域”,也不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而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信仰共同体”。第三,他们必须面对“经济”——衣食住行、财产分配等等这个“社会存在”,其社会制度是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共同拥有社会财富,没有所有制导致的财富分化,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平等。第四,这个社会也是穆罕默德试图建立的社会,也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理

想。拥有这种社会理想的穆斯林才是真正的穆斯林。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有着某种道德信念,道德上“纯洁的”、有社会“使命感”的革命领导人领导下的民主,即“指导下的民主”,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这种“民主”更强调领导人的道德责任和前提,因为,一般的穆斯林需要在道德上予以指导。他所定义的“乌玛”,既包含了传统的伊斯兰价值(“人人皆兄弟”),又包含了现代的社会主义价值(“以平等、公正和人民财产所有制”),既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又结合了伊斯兰的道德政治理想。他的“乌玛”既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也包含着传统的宗教价值向往,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

沙里亚蒂对当时伊朗社会现状和性质的认识和分析,是巴列维统治时期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思想领域的曲折反映。沙里亚蒂以这些分析和认识为起点,对未来的社会面貌、性质、结构和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也做出了大胆的设想和渲染,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使命观,极其典型地反映了伊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断裂现象。按照沙里亚蒂的认识思路,在一个社会思想全面保守,人民大众普遍不觉悟的情况下,“启蒙的使命”不仅成为他个人的使命,同时也是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他用“主体性”唤醒了当时普遍潜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这些混合着现代思想和传统宗教价值观的激进主张,非常及时地迎合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对现状不满的社会心理。隐藏着巨大社会不满的时代正是革命理论家大有作为的时代。作为一个革命鼓动家,沙里亚蒂的成功恰恰是建在需要理论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沙里亚蒂的社会思想独特性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释〕

¹ 另外两个是霍梅尼和蒙塔哈里。作为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和鼓动

家,阿里·沙里亚蒂的激进宣传对伊斯兰革命动员,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动员起到了巨大作用;作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他的一套理论主张对当今的伊斯兰世界思想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还在持续。但国内中东学界对此人缺少应有的重视。据笔者了解,国内关注此人的稍早有冀开运教授的《伊朗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梯》(《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中有王宇洁博士的《阿里·沙里亚提的宗教政治思想》(《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5页),今有笔者的《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南京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未刊)。文中引用但未注明出处的沙里亚蒂单篇文章,均来自www.shariati.com网站,该网站为阿里·沙里亚蒂之子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官方网站。

④该隐和亚伯为亚当和夏娃之子。

④以吠陀经最后一部分,即《奥义书》为基础的印度哲学。

〔参考文献〕

[1] Ali Shariati. On the Sociology of Islam[M]. Mizan Press, 1979. 117 - 118. 118. 99. 119- 120.
[2] Nikki Keddie(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1.
[3] Ali Shariati. Islamology. [DB/OL]www.shariati.com.
[4] Ali Shariati. Man and Islam[M]. Free Islamic, Lit INC., 1981. 71. 103. 30. 104.
[5] Ali Shariati. Jihad and Shahadat. [DB/OL]www.shariati.com.
[6] Ali Shariati. Ali' Shiism vs Safavids' Shiism. [DB/OL]www.shariati.com.
[7] Ali Shariati. Nonuz: A Celebration Speech at the Noruz. [DB/OL]www.shariati.com.
[8] Ali Shariati. The Median School of Islam. [DB/OL]www.shariati.com.
[9] Ali Shariati. What Is to Be Done[M].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 1986. 17- 18. 21. 23.
[10] Ali Shariati, Arise and Bear Witness[M].

Ali Shariati' Social Thought

PEI Yun- yong¹, WANG Ze- zhuang²

(1.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Abstracts: Ali Shariati (1933- 1977), one of the three major ideologues of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had notably created a fairly well- documented and systematic Islamic Ideology for the Revolution, earning him the f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Mujahedin Guerrilla. His social thoughts as the main portion of his Islamic Ideology were implied by both his definition of Ummah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during the Pahlavi regime.

Key Words: Ali Shariati and His Social Thoughts; Ummah;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责任编辑 王立平〕